

作家说

毕淑敏：阅读是门槛最低的“世界参观券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实习生 张清源

你知道吗？当你坐在教室朗读海明威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时，非洲的猴面包树正在用年轮撰写千年史诗，南极的冰雪正在结晶成六角形的伟大诗行，而加拉帕戈斯的海鬣蜥，它的每片鳞片都在吟唱潮起潮落的警句……如果你暂时无法亲临现场，可以选择先打开一本书。

近日，毕淑敏出版新书《读行九万里（青少版）》，以沉浸式环球旅行为载体，打造60堂读写课，带领青少年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。

毕淑敏当过生理上的医生，也当过心理上的医生，这让她在写旅行的时候，也融入了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知识。当然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作为一个写过几百万字散文小说的作家，这种叠加也让她旅行文章拥有更多视角。

近日，毕淑敏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独家专访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：为什么想为青少年出版这样一套丛书？

毕淑敏：选编这套《读行九万里》丛书的初衷，来自我自身的经历、后来的旅行经验，加之多年的思考和回忆。

在我充满好奇心的年龄，由于时代因素，能够接触到的有关世界的知识比较有限。年长以后，我才有条件和时间，走出国门、周游世界。那时的我，已然是个中年人，历尽沧桑。

这些年，我看到青少年成长的状况，心生关切。孩子们通过手机接触到繁多信息，容易被碎片化的内容分散注意力，难以系统地认识世界，比较缺乏开阔整合的全球视野。但真正外出旅行，特别是环球旅行，需要很多时间和财力的支撑。这对大多数家庭而言，并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矛盾和困难，不应成为阻挡我们思想远行的理由。于是我希望以浓缩的篇幅，在尽可能精当的选篇中，为孩子们展现出微缩的世界面貌，使得目前无法亲身远行的孩子，先在文字的旅程中起步，逐渐感受到这颗蔚蓝色星球的神奇美妙，感受到世界的五彩缤纷与多元文化。

我期望，未来的某一天，当今天的小读者当真走向世界，看到书中曾经描绘过的风土人情和历史风云时，能开心一笑——噢，我之前在书中读过有关这里的知识！现在虽是初次走过，却有熟悉感扑面而来。

我希望读者能从这套书的字里行间，在向外观察世界的同时，也能在某个瞬间联想到自己的内心。世界飞速变化，但学会共情、反思与表达，正是全球化时代中我们最宝贵的素养之一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：在您看来，这套书作为“纸上环球课”，能带来哪些真实旅行可能没有的东西？



《故宫掌门人1925-1949》书封。中华书局供图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如今，故宫博物院已成为全球瞩目的文化地标。如果此刻，重返百年前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的现场，你会看到什么？1925年10月10日下午二时，故宫博物院开幕典礼在乾清宫前举行，庄严宣告故宫博物院成立。开院之日，李煜瀛手书的“故宫博物院”匾额高悬在神武门上方，北京市民纷纷涌到故宫，想一睹数百年来壁垒森严的皇家禁地及神秘藏宝。

这是《故宫掌门人1925-1949》一书中描述的画面。这本书的出版，恰如一把钥匙，带读者穿过尘封的岁月、透过沧桑的宫墙，看见故宫背后那些鲜为人知但不可或缺“守护故事”。

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，是如何演变为如今的博物院的？在演变过程中，是谁在为它谋划未来，想尽办法保存其中的文物珍品和历史遗存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故宫和它的历任掌门人又见证了哪些历史？

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正是《故宫掌门人1925-1949》作者章宏伟所要讲述的内容，他带我们重回故宫博物院成立24年间的“第一现场”。

“我更希望重现这7位掌门人在故



毕淑敏和非洲的孩子们在一起。

毕淑敏：谢谢你为这套书起了个很有趣的名字——纸上环球课。有句古诗说过，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书本上的知识，远不能弥补真实旅行带给人的震撼和感动。所以，如果你有机会，请一定亲眼看一看这个世界。如果各方面的条件目前还不允许，那么，就请先翻翻这套书吧。

它的好处是，你花费不多，就可以比较从容地环球走一趟，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，涉猎到一些有趣的知识。当你将来有能力作出决定的时候，这套书就是你的向导和小参谋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：无法取代真正的旅行，那您对这本书的定位是什么？

毕淑敏：一是初步搭建起系统性的认知建构。说句心里话，出外旅行很辛苦，经常是晓行夜宿，甚至颠沛流离。受限于时间、体力、路线等限制，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时候很多。我回国后，会查很多资料，并反复推敲资料的可靠性，在力求准确的同时，也尽可能地追求可读性，让它不那么枯燥和单调。

我有个小小心愿，希望自己笔下的文章，能像一枚枚小小的“认知胶囊”，尽量融合地理、历史、文化等方面的思考。比如，当描写书中非洲稀树草原的壮阔与茂盛时，也涉及它是如何影响人类的起源乃至文学的想象。这种收集和积淀的功夫，我是不敢怠慢的。

二是可重复使用的“心灵健身器械”。限于时间和财力，我们到远方的旅行，路程多半是不重复的，有些风景和人物，初见即是永别。但谈旅行的书，则可以从反复阅读并随时翻阅。青少年处在成长的阶段，我跟你打个赌，你在不同年龄、不同心境下读书，即便是同一篇文章，获得的感悟也常有所不同。所以，这

套书，也许会起到可重复使用的“心灵健身器械”作用。

在真实旅行中，青少年可能直接面对文化冲击、语言隔阂，甚至当地人的偏见误解，不但有人身安全问题，还会有心灵安全问题。本套书中的文字，安静温和，循序渐进，多处设置引导式提问，让青少年在接触陌生文化前，能作好一定的心理准备。

比如，在讲述南非索韦托黑人贫民窟时，在呈现历史背景的同时，设问“如果你，会如何面对这样的过去”，引导孩子理解创伤与和解。这种情感预热，对初次睁大眼睛看世界的青少年们，我认为必要的。

三是不受现实条件限制的“公平探索权”。每个孩子的家庭经济情况是不同的，希望孩子们无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，无论经济条件如何，都能通过阅读平等地接触世界。这套书可算是一张“最低门槛的世界参观券”，希望它为打破资源不均所带来的认知壁垒，尽一份薄力。

四是从“观察者”到“思考者”的角色升级。在普通旅行中，孩子们多半容易成为被动的“观光者”，这套书想通过提问和导引，让孩子们在观光的同时启动思考。比如，我在《一座像大脑的建筑》这篇文章中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“你觉得这座建筑背后反映了怎样的价值观？”希望这种尝试，能有好的效果。

当然了，任何一套书，都不能取代真正的旅行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：如何用文字让画面更感知？

毕淑敏：认识世界，不仅仅是视觉的盛宴，亦是听觉、嗅觉、触觉等的叠加合体。这些散文，多用比喻，以求好懂。我写北极光，先说关于极光的古老传说，又



受访者供图 《读行九万里（青少版）》书封。

说它犹如巨大的绸缎被天神之手轻轻拧动；写赤道，我将地球比作西瓜，一刀切开，就被分成了南北两半球……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：您在序言中说“希望这套书好玩加有趣”，在这方面有哪些巧思？

毕淑敏：巧思不敢说，下了一点点小功夫。比如，在标题的设置上力求引人入胜，“赤道上的左右漩涡和竖鸡蛋证书”“王子的1000种苹果树”“世界的肚脐”等。编辑还在讲述旅行的故事中，设计了许多互动式的“好玩游戏”，如“北半球的浴缸——猜一本中国古籍”“一亿年前的北京城——猜一位中国历史人物”。书中还藏了不少“任务卡”，比如“长颈鹿的舌头为何是紫色的”“为什么太平洋是最晚被人类征服的大洋”“海鬣蜥的体长为什么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”等。这像一场寻宝游戏，让阅读从被动的接收变为主动的探索。好奇心被点燃，学习才能真正变得“好玩加有趣”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：您在作品中常融入心理学背景，这是出于什么考虑？“认识世界”与“认识自己”之间，存在怎样的关联？

毕淑敏：所有外在的行走，最终都是为了内在的探索。世界是一面巨大的镜子，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处风景、每一种文化，映照出的都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：当旅行变成写作素材的积累过程，会给您带来精神压力吗？

毕淑敏：刚开始会有压力，经历得多了，走的路线多了，就渐渐淡然，习以为常了。我在这套书中写道，猴面包树如何在干旱中蓄水生长、海鬣蜥怎样在恶劣环境里进化适应，它们是自然界的“破题高手”。大自然用进化的智慧告诉青少年：困境从来不是前进的终点，恰恰可能是新奋斗的起点——你愿意换个角度，保持好奇与开放，灵感就会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，翩翩降临。

重返百年前故宫现场

宫博物院成立和存续当中的抉择和担当——视国宝为生命，将国宝文物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。”章宏伟说。

纪念“文明守护者”，尊重故宫博物院背后的历史

翻开《故宫掌门人1925-1949》，读者会得到一张9厘米见方、形似邮票的藏书票。

藏书票上半部分是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时悬挂有“故宫博物院”匾额的神武门；下半部分是故宫博物院首任掌门人李煜瀛的话：“希望故宫将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一个死的故宫，必为世界上千千万万个活的故宫。”

书中收录的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、档案手迹等，成为还原“第一现场”的关键。

深耕故宫研究20年的章宏伟，是故宫出版社前社长、故宫学研究所前所长。他利用故宫档案、民国报刊、人物传记等一手史料和海内外研究成果，采撷历史亲历者、见证者的视角，力求还原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这段隐秘历史的真实样貌。

“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，我们不谈脏话，不说虚话。”章宏伟说。

章宏伟1998年调入故宫博物院，就为故宫的博大精深所折服，马上进入如饥似渴的学习状态。

他与故宫博物院史的结缘，源于编辑《故宫尘梦录》这部书稿。“当时，有关故宫院史的书很少，只有《故宫博物院历程》《故宫沧桑》《紫禁城的黎明》寥寥可数的几本，而《故宫尘梦录》是故宫前辈的回忆著作，是我自告奋勇接过的编辑活儿。在编书的过程中，我对院史有了更多的了解，也加深了对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复杂性的认识。”

从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、1925年10月10日成立故宫博物院，到1949年间，风雨飘摇中的故宫先后迎来李煜瀛、庄蕴宽、赵尔翼、江瀚、王士珍、易培基、马衡这7

位掌门人。

在文化政治的大变局中，这7位掌门人和千千万万有识之士为保护故宫和中华珍贵文化遗产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。

章宏伟说，介绍这些掌门人的生平行事，既是对他们的一种纪念，也是对故宫博物院历史的一种尊重。

重返故宫博物院每个“历史性的一天”

“故宫的古建筑、文物藏品、历史遗存，以及在此出现过的人和事，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。在故宫，人们能够感受这一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。”章宏伟如是写。

章宏伟尽可能给那些老照片标注精确的日期，“像1924年12月24日，这是故宫物品点查开始的‘历史性的一天’”。

书中展示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点查清宫物件这一天的两张照片，章宏伟不仅标出了日期，还非常细致地标上了上午和下午。

章宏伟提到，以往大家使用这一天照片的时候，往往都用“下午的那张照片”，但他认为，对于开始故宫物品点查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上午这张照片更有意义。“像这些时间标注，都是我一点一点考证出来的。”

时过境迁，回首看彼时的故宫每一日都是“历史性的时刻”。跟着书中的文字和图片，仿佛站在宫墙内的“现场”，看着重要的节点是如何一步步书写的。

章宏伟在书中写“点查清宫物品”这件大事，颇有画面感。每次清点，除工作人员外，还有军警参加，参与者最多时有近20人。点查物品是以宫殿为单位，由入门左侧起，将物品逐件编号、依序记录。各宫殿被逐一按“千字文”编号，如乾清宫为“天”，坤宁宫为“地”，南书房为“元”、上书房为“黄”等。物品的编号有总号、分号之别。

书中特别提到，“天字第一号”物品竟是“二层木踏凳”——因为工作人员踏进乾清宫殿门，首先应当查看者就是此物。

而在故宫博物院开院前夕，京津各大报登出了“故宫博物院开幕广告”。“市民见报上消息，很多也赶来参加。”《黄报》载，“惟因宫殿穿门别户，曲折重重，人多道窄，汹涌而来，拥挤至不能转侧，殿上几无隙地，万头攒动，游客不由自主矣。”

在《清室善后委员会参观故宫暂行规则》中提到，“本会点查故宫尚未完竣，而各界要求参观者人数日多，规定参观时间是“每星期六、星期日下午一时至六时，但三时即停止售票”；收费标准是“券价每张大洋壹圆”。

“紫禁城这座昔日皇帝居住的禁区变为人民自由参观的场所；一座国家博物馆”。章宏伟写道，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轨的开端。

故宫人有“视国宝为生命”的典守精神

章宏伟在书写故宫博物院历任掌门人时，都在章节名上给出了一个概括语：“拨云见日的开拓者”李煜瀛、“岿然不动的守护者”庄蕴宽、“时运不济的接管者”赵尔翼、“临危受命的担当者”江瀚、“心无旁骛的维持者”王士珍、“奋发蹈厉的贡献者”易培基、“晨兢夕厉的典守者”马衡……

在7位掌门人中，马衡所占篇幅最大——他在任时间最长，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事情也极多。很多读者对马衡故事的关注，有一个重要聚焦点是：在战火中，故宫文物经历了什么？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日军侵占东三省。如果日军继续南下，华北成为战场，文物势必遭殃。故宫文物是迁移他处，还是就地保存，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政府组织各方开启了文物南迁之路，文物最后辗转转于南京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日军全面侵华，南迁文物又开启了长达10年的漂泊之旅。

“也许真的是古物有灵，炸不到，摔不碎。”章宏伟提到，抗战时期，西迁文物万里关山，多次险遭灭顶之灾，但所幸都是有惊无险，文物未有损失。马衡本人曾经说：“像这一类的奇迹，简直没有法子解释，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。”

章宏伟感叹，故宫人把故宫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起，与民族独立、民族尊严连在了一起，深刻地认识到所保护的文物是“国家的福命”。故宫人有一种“视国宝为生命”的典守精神。

在《故宫掌门人1925-1949》新书分享会上，回顾故宫六百年历程时，文化部原副部长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森指出，1420年至1912年年初，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，呈现的是宫廷文化、帝王文化。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直到现在，故宫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“它由帝王私有变成了人民公有，成了一个社会文化的公益场所。这100年来走过的历程是相当不易的。”

郑欣森表示：“如果说我们要选一个文化遗产地来代表中华历史文化，我认为只能是故宫。故宫的文物反映的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生生不息的智慧和创造。”而故宫的使命还在于，“由于历史原因，故宫形成了两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局面，这是世界上独有的。故宫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，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统一的历史责任”。

郑欣森感慨，《故宫掌门人1925-1949》的出版，能让读者更深切地感受到保护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博物院的不易，对以这些掌门人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守护者，发出由衷的敬意。



《故宫掌门人1925-1949》藏书票。中华书局供图

阅读观

□ 王钟的

是人写的，还是AI写的？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普及以来，这个问题便萦绕在文学写作领域。不少读者化身“AI鉴定侦探”，给文学作品逐字逐句“捉虫”，一旦嗅到字里行间的“AI味”，便将其视为作品的硬伤。

作为报刊编辑，我在日常加工处理稿件时，也时常陷入类似的困惑。面对某些行文规整却透着套路化的段落，心里总会犯嘀咕：这段是不是用AI写的？它的逻辑是不是太顺畅了？文笔是不是太“优美”了？比喻是不是过于天马行空了？

可“AI味”终究是一种阅读的主观感受。作品究竟是不是用AI写的，往往难以找到“实锤”。目前，尚无一款成熟产品能准确鉴别文本是否由AI生成，未来恐怕也难以实现。此前，有人尝试检测《滕王阁序》的AI率，竟得到100%的回复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升级迭代，可以想象的是，识别文字是否属于AI创作会变得越来越困难，AI与人类写作的边界也变得模糊。“用AI对抗AI”，很可能是一场漫长而无果的追逐。

AI不仅可能掩饰自己的非人类特征，甚至可能反过来调教人类的写作思维。一位大学老师最近就分享了这样的经历：学生作业越来越有AI的味道，他相信这并不是因为作业完全由AI代劳，而是因为长期使用AI以后，学生不自觉地沿用了AI的表达逻辑，就连一字一句敲出来的作业也“AI化”了。

“AI焦虑”也传导到了写作者群体中。对许多创作者而言，如果自己的文字被认为AI生成，不仅是对其写作技能的质疑，更是对其文品的否定。为了避免误解，一些作者不得不开始“自我审查”。AI偏爱用破折号，就刻意减少破折号的使用；AI常反复使用某些比喻意象，便刻意规避这些表达。原本自由的创作，渐渐变成了一场与AI“划清界限”的较量。

阅读本应是一场读者与作者灵魂对话的旅程。我们在文字里理解作者的喜怒哀乐，感受不同的生命体验。如果阅读时始终陷于“这是不是AI写的”的怀疑，阅读的纯粹与自由难免被焦虑吞噬。

近日出版的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一书中，主编陈平原教授在序言里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世界史上，每次特别重大的科技进步，都会伴随一定的价值重组、社会动荡，以及知识结构的变迁，这回自然也不例外。若干年后，震荡期过去了，回头看，今天的好多想法与论述，很可能显得幼稚可笑。但那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寻路的迷茫、痛苦与挣扎，值得尊重与保存。”

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，我们仍处在AI融入文化生产的初级阶段。AI让人们对“真实创作”的判断陷入分歧，震荡与困惑难免存在，但技术变革的脚步从不会因此停滞。人类迟早要为适应这一变革，重新调适对“写作真实”的定义。就像如今，恐怕没人会质疑用键盘打字不属于“写作”，尽管键盘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纸笔。

有人避之不及，生怕沾染上一丝“AI痕迹”；也有人坦然接纳，主动承认AI在创作中的辅助价值。2024年1月，日本第170届芥川文学奖揭晓，33岁的获奖者九段理江在感言中透露，其获奖作品《东京都同情塔》中约有5%的内容，是完全由AI生成的，并且是“原汁原味”一字不差地使用，没有任何修改。此事很快在文坛引发轩然大波。

不过读过该书便可发现，作者使用AI的部分主要是小说中某一角色与ChatGPT的对话，而非故事主体。九段理江认为，这并不构成对读者的欺骗。事实上，若刻意编造一段虚假的AI对话，反而容易弄巧成拙。

更值得担忧的问题是，随着AI替代一般写作需求的能力提升，写作会不会成为一种“奢侈品”或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？美国投资家兼商业作家保罗·格雷厄姆提出，因为AI对一般性写作能力的替代，未来不再有好的写作者、还行的写作者、不会写作的人，取而代之的将是：好的写作者和不会写作的人。

不管AI未来变得多么强大，“好的写作”总会脱颖而出。同在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一书中，蒋寅教授认为：“文学活动的体验性过程，正是文学的永恒生命力所在。文学对于人的意义，根本在于经验世界的拓展。”人作为有着独立意志的生命个体，其笔下的文字始终承载着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。即便未来AI真的发展到有独立思想的那一天，那也绝非对人类体验的取代。

在争议中，已有文学杂志以“冒天下之大不韪”的勇气尝试与AI共存。今年年初，知名文学杂志《十月》就发起了一场征文大赛，邀请文学爱好者、AI创作关注者，与DeepSeek等AI工具围绕“返乡叙事”共同展开创作。

显然，现阶段AI不能替代人在物理意义上的“返乡”，更无法复刻人们对故乡的情感记忆。但借助AI完善返乡写作，并以公开、透明的方式展示作品，对比差异，不失为一种开放且有意义的探索。当我们敏感于“AI味”时，真正担心的或许不是AI介入写作，而是创作中“人味”的流失。

AI或许将改变写作的方式与阅读形态，但不会瓦解阅读的本质价值。现阶段，我们不必因AI的存在陷入怀疑主义，也无需为“避坑”而束缚创作的手脚。保持阅读的习惯，呵护用文字表达的能力，我们终将与AI更融洽地相处。

对「AI味」敏感，表达了对真实体验的珍视